

上世纪30年代《益世报》

清晰记录莫子镇的为民情怀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张彦广

入党时间依然是谜

8月6日,《吴桥首位共产党员莫子镇受李大钊影响走上革命道路》一文见报后,受到社会关注。

寻亲志愿者、律师王吉仓在《寻觅真实的刘格平》一书中,找到了依据。在书中第82页的注释中,有一段关于莫子镇的介绍:“莫子镇,河北吴桥县莫家村人,1926年入党,在家乡建立了党支部,1928年曾在天津一带以国民党身份开展活动。后经刘格平证明其共产党员身份。”这部书由刘格平传记编委会著。

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德峰介绍,他曾参与《刘格平文集》一书的编撰出版工作,对一些情况较熟悉。1926年,刘格平受中共天津地委和直隶省国民党支部派遣,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津南各地检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。当时,他手中有共产党员联络名单,其中就有莫子镇。当年9月,刘格平来到吴桥莫家场,以同学关系在莫家住了两天,听取了莫子镇的汇报,并批准建立了莫家场党支部,莫子镇任支部书记。关于莫子镇的情况,刘格平曾说,莫子镇是在北京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,但并未说明他的入党时间。

由此可见,尽管有注释,依然无法确定他的入党时间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莫子镇入党,肯定



登载莫子镇事迹的上世纪30年代的《益世报》

在1926年9月之前。

领导人民集体抗税

吴桥文史学者刘晓,提供了两份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《益世报》,上面报道了莫子镇在家乡吴桥期间,领导人民集体抗税,以及致力发展农村凿井事业,以期富民的事情。

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民国22年(1933年)8月30日,《益世报》第三版头条。题目是《吴桥成立民业银号掀动大波》,副标题是《因挪用支应还款捐之存款,三百余村人民誓死不承认 发出告全县民众书》。文章写的是,吴桥有13万余元的随粮带征支应还款捐,本来应该发还大家。一位刘

姓乡绅提议挪用这笔款项,筹备成立民业银号,并已发出公函,通知各捐户,定期成立。作为民众代表的莫子镇与县党部党委张国基等人,认为没有征得人民同意,就擅动款项,是违法行为,于是联络各村乡长,向县政府呈递请愿书。请愿书上联合署名的有300多村,风潮之大,前所未有。报道中还附录了《告全县民众书》。这篇战斗檄文性质的文章出自谁人之手?是否出自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生莫子镇?我们不得而知,但从中依然可以感知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惧强权、为民请愿的凛凛风骨。

请愿书中写到:“……吾等遽闻此信,发均上指,目皆欲裂,咸谓白日青天,何竟黑暗如此。今若辈之目的既达,吾人之还款无望,加捐本为还款捐,加款竟不还,失信重征,此吾全县二十

万同胞所应不越轨范,据理力争,以与此三五劣绅作殊死战者也。惟望各乡长副,家喻户晓,万众一心,并须请求县储,将此款复还我人民。如人心不死,公理尚存,则吾等之请求,必有达到之一日;设或公理不足以战胜强权,吾等亦惟有予以誓不承认。此头可断,此心难移,皇天后土,实鉴血诚,尚祈全县同胞,其共图之……”

抗旱灾发展凿井事业

另外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民国24年(1935年)6月1日,天津《益世报》第三版“社会服务版”上,题目是《吴桥县农会征集凿井计划》,副标题为《愿以最小劳力收得最大效果,深盼实业先进专家加以指导》。文章的内容是:吴桥县农会干事长张驾欧、副干事长莫子镇给《益世报》写来一封信函,信函中说,1935年吴桥大旱,庄稼本已歉收,棉花种植又错过时令,损失巨大。农会决定凿井灌田,以解农村经济疲敝的现状。信中写到:“所幸敝县合作事业方兴,运用相互力量,尚足以补救万一。惟凿井事业,应视经济能力,以最小劳力,收得最大效果。关于周详计划及从事技术,土法简陋,极不经济,实有待于改良先进及实验专家之指导。敝会忝为农民领导机关,敢代表全县二十万农民呼声,恳请贵部代为征求经验先进及专家意见或书物,以为亡羊补牢之计,抵抗大自然之威,民生经济,实利赖之。敢请各方家不吝指教,谨代表全体农民泥首矣。”

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

捷地发现 抗战时期“救国捐”

与渤海回民支队有关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

日前,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张金海,拿出家中珍藏的“救国捐”展示给记者看。“这是抗日战争时期,我爷爷张太和给八路军捐的东西,名为‘救国捐’。听爷爷生前说,当时他捐的东西很多,家中有不少‘救国捐’。开始没太重视,丢了不少,现在只剩下5张了。”

记者看到,这些“救国捐”内容不同,其中一张上写着:“今收到一百五十元救国捐。”盖着“冀南第六军分区司令部游击大队部”的章。另一张的内容则为:“今收到张太和捷地镇天利号自动救国捐一万元……”下面署着教导员和经办人的名字,可惜因为年代久远,名字已辨认不清,旁边盖着“冀鲁边军区时务大队”的章。另外两张“救国捐”内容相似,盖的章却不同,分别是“冀南第六军分区津南支队第二手枪队”“冀南第六军分区津南支队第一手枪队”的章。还有一张“救国捐”,内容与上面4张稍有不同:“请张泰和先生速筹毛巾五打、汗巾一打,日光皂?条(字迹已模糊),草帽十个。近日迅速运到堤口村公所为盼。”盖的是“八路军沧县抗日锄奸团”的章。

张金海今年69岁,土生土长的捷地人,从小在运河边长大。他说,爷爷名叫张太和(有的“救国捐”写成“张泰和”),这些“救国捐”,都是爷爷捐的。爷爷当年在运河边小捷地渡口大桥附近开有“天利号粮栈”,渤海回民支队队长刘震寰曾在粮栈当伙计,并以此身份为掩护,秘密从事抗日活动。张金海介绍,爷爷与中国共产党沧州的早期领导人刘格平、刘子芳都有亲戚关系。他痛恨日本鬼子,先后卖了很多地筹钱买了各种物资,资助抗日部队。有汉奸告密张太和暗通八路,恰巧被在日军处做饭的本村厨师听见了,他马上偷偷告诉了张太和。张太和沿运河泗水而逃,躲过了一劫。

张金海说,爷爷为人仁义,他卖地不卖井,为的是让村中老的少的能喝上水。那时候,全家都在秘密为抗日做事。家中的女人们为抗日战士做军鞋,十几岁的父亲秘密运送抗日物资。父亲曾跟他说,当时他骑驴,鞍子下藏着手枪、子弹,或者其他物资,通过日本鬼子的炮楼和岗哨。因为年纪小,不引人注意,他一次次机智地化险为夷。

“救国捐”的发现,是沧州儿女支援抗战的又一明证,对研究抗日战争有重要价值。



张金海展示他收藏的“救国捐”。

老兵重走长征路

热心传播红色文化

仲夏的成都,蓊郁清爽,清早的山风飘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。高秀林早早骑自行车出了门,白色衬衫上,党徽异常鲜艳。这是今年他的第20场宣讲。虽然重病残躯,但只要讲起红色故事,老人眼里都是光。

让“剩下的”日子有意义

高秀林是泊头王武庄乡后河村人,今年70岁,从2008年10月开始,历时197天重走长征路,并在沿途触景生情写下136首诗。老人整理出部分诗歌出版,编辑出书《长征梦歌》。几年来,老人身在成都,担任四川师范大学传统教育辅导员,及多所中小学的课外传统教育老师,讲红色故事,传红色精神。今年,他同四川的老红军老干部们组成红色宣讲团,共同努力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红色精神在四川大地传承。

高秀林告诉记者,他从小跟姥姥长大,舅舅是红军,从小姥姥就给他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。家庭的耳濡目染,让高秀林从小对党就有朴素的感情。17岁时,他参军入伍。80岁的姥姥把他送到军队说:“年轻时送去一个红军,70岁送你哥哥去参军,没想到80岁了,又送出一个解放军。”

入伍后,高秀林刻苦训练,很快加入了共青团。第二年5月25日,刚满18周岁的高秀林加入中国共产党,随后当了班长。1971年,他在一次战备任务中严重受伤,锁骨、肋骨多处骨折。1973年,他退伍回家后没有申请国家照顾,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。

2005年,高秀林的儿子考上大学,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中。就在这时,高秀林发现左胸位置的疼痛加剧了,还长了个肉疙瘩。他以为自己患上了绝症,就想“让剩下的日子有意义一些”。

2008年10月10日,从江西瑞金出发,他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踏上了自己的长征路。

同样的步调再次“长征”

重走长征路之前,高秀林就已经把红军长征途中的各个历史事件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走上长征路后,他就给自己定了计划:要和当年红军的步



高秀林宣讲后,少先队员为他戴上红领巾

调一致。

长征中,红军行军用了大约200天,打仗用了60天,休整、开会和做群众工作约110天。高秀林一个人的长征,也严格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来执行。“红军当年行军的时间,我也步行走长征路;红军当年打仗的时间,我就停下来根据一路的感悟写诗歌。”

2009年10月11日,高秀林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,沿着先辈走过的路,终于抵达了陕北吴起县。

高秀林告诉记者,为了感受当年红军爬雪山的情景,他徒步爬上了海拔4900米的夹金山。在离夹金山山顶10多米的地方,他由于海拔高缺氧,实在走不动了,但仍在盟兄弟儿子的搀扶下,登上了顶峰。在终年积雪的山顶,他脱下棉袄,留在了那里。一首《挡一些风寒》,最能记录他当时的心情。

“重走长征路,我实际用时197天,其间我一共在158户农家借宿,受到165位沿途朋友的帮助,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出136首诗歌,认了7个干女儿,结拜了6个盟兄弟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红色故事串起“红线”

长征路走完后,老人又开始了新的“长征”。他的诗歌都是徒步过程中写下的,匆忙之中,一些语句不是很

这封信透露了两个信息:一是希望借助《益世报》,取得凿井专家的帮助,以便发展吴桥农村凿井事业,解决天气干旱带来的农业经济凋敝问题;二是当时吴桥农村已有合作组织,且势头强劲,方兴未艾。

刘晓说,最近出版的《沧州红色记忆吴桥卷》中,详细记载了1925年吴桥大旱,莫子镇从天津购买当时最先进的灌溉机器——骆驼机和附属设备,汲取运河水,无偿为村民灌溉农田的故事。书中写到:“受益的农民们感激万分,赞扬莫子镇‘上过大学的人,懂的事儿多’‘他是真心帮助穷人’。借此,莫子镇办起了农民合作社,将松散的农民初步组织起来。《益世报》的报道,既从史料方面证明了莫子镇创办农民合作社的事实,又记述了10年后吴桥再遇干旱,莫子镇发挥农会作用,发展凿井事业,为农民减少损失的情况。”

刘晓介绍,《益世报》是天津最有名的报纸之一。上世纪30至40年代,《益世报》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,立场鲜明,成为国内反抗日本侵略最激烈的大报,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,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因其立论公正、秉笔直书、成为民国乱世之激越清流。该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笔文章和往事钩沉。罗隆基、梁实秋、田汉、钱端升、张秀亚、范长江、张恨水等,都与《益世报》紧密相连。1921年至1922年,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,还曾为《益世报》写来560篇海外通讯。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他曾是仪仗队 “军中一把刀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陈四雄



48岁的顾庆林有着明显的军人印记,身高1.82米,英姿飒爽,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坚韧的光芒,说起话来铿锵有力。他是青县人,如今在北京工作。

即使转业已经10年,他依然能走出最标准的正步,“踢腿如射箭,落地如炮弹”,一抬腿就是毫厘不差的0.25米,犹如记忆般刻在他的身体里。这是他参军19年的标志,也是他一生的荣耀。

走进仪仗队

顾庆林出生在青县金牛镇小牛庄村,儿时好动,爱好体育的他不仅擅长铁饼、跑步,还跟着师父习武练拳。中学参加运动会,他在铁饼项目中保持的赛会纪录,至今无人打破。

参军报国、建功立业是许多热血男儿的梦想,顾庆林也不例外。1991年12月,他参军入伍,成为北京卫戍区某部的一名战士。一入部队,便被仪仗队选中。

他说,仪仗队是“共和国”的名片,象征着国家或军队的最高礼仪。仪仗队的队员更是千里挑一,在身高、体重、五官、眼神等都有严格要求的条件下,17岁身高1.82米、长相俊朗的顾庆林一路过关斩将,被仪仗队招收。1分钟不眨眼、军姿4个小时不倒、早晚5公里训练……这些都是常态训练。从此,顾庆林的生命与仪仗队连在了一起。

“军中一把刀”

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和良好的身体素质,顾庆林不久便担任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仪仗队执行队长,负责接待各国军事首脑,被誉为“军中一把刀”。

除了日常站军姿、走正步,他还要练习军刀、喊口令。为此他戒烟、戒酒、戒茶;每天早上到树林里一遍遍练口令;为追求人与刀与口令的和谐,每天练习军刀系列动作上百次——拔刀、立刀、持刀、撒刀、刀入鞘。手掌磨破,胳膊红肿,手上留下无数伤疤。

“难度最大的是刀入鞘,按要求,不能用眼睛看刀,完全靠练。一开始,很难准确感觉刀尖与鞘口的位置,迅速插下去的军刀常常刺偏,手不知被扎过多少回。”一刀见血的伤痛令他记忆犹新。

血与汗中,他没有放弃,一次次完成了刀鞘的完美结合。顾庆林担任仪仗队执行队长14年,接待过200多个国家的军事首脑,上千次展示中国军人的风采。

2009年,35岁的顾庆林被选为国庆阅兵仪式特种兵方队的总教练。不同于往日,训练一支经常野外作战的300多人的队伍,身形一致,所有压力都汇集到他一人身上。

“站军姿、走正步,都是有技巧的,不是用蛮力,而是用身体的协调性去练习,然后促成肌肉记忆。”顾庆林将一身武艺带到军营,让大家受益。

转业传武功

2010年,顾庆林从部队转业。

2019年,新中国70周年华诞。顾庆林返聘回部队,担任群众游行仪仗队国旗方阵总教练。

短短几个月的封闭训练,十分艰苦,顾庆林作为总教练给大家做思想工作:“参加国庆阅兵,很多人一辈子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,这是任务,更是荣耀!”

当年10月1日,一面长35.1米、宽23.4米、重220公斤的巨幅国旗在群众游行第一方阵的上方徐徐展开。1949年仪仗队队员将国旗高举过头顶并用月季花簇拥,缓缓经过天安门。此情此景,让台下的顾庆林比赛场上的队员还要激动。

转业后,顾庆林保证工作之余,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武术的传承上。他自幼习武,12岁正式拜师,曾先后练过铁砂掌、鹰爪功、燕青架子功、八卦掌等。

作为传统武术中的古老拳种,燕青拳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威名。如今,亲眼目睹这一拳种乃至中国传统武术的日渐衰退,顾庆林深感责任重大。

为了成立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燕青拳专业研究会,顾庆林到处奔走忙碌。“我们现在成立了5个训练基地,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教拳。我的心愿是把拳谱整理好,一代代传给后人。”顾庆林说。

每天闲暇,顾庆林都会看看那些军功章,当兵19载,荣誉二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两次、“外事标兵”11次……他觉得,这是他一辈子的荣耀。